



Hannah Arendt

【德】罗·科勒尔编



汉娜·阿伦特/海茵利希·布鲁希尔

书信集 *Hannah Arendt
Heinrich Blücher*
Briefe 1936-1968

孙爱玲
赵薇薇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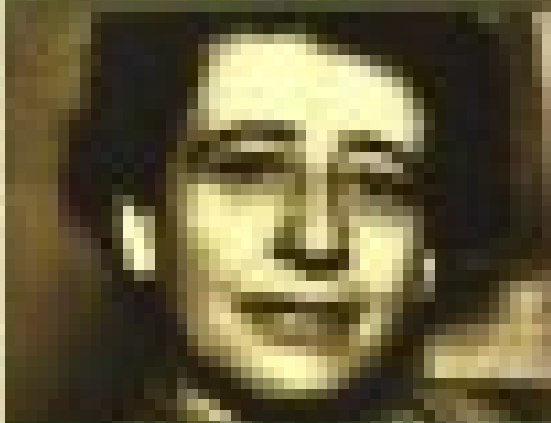


Heinrich Blücher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38-1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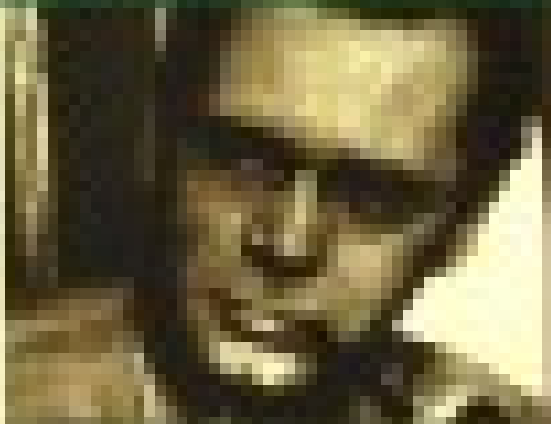


文集

Hannah Arendt
Selected Essays

Briefs 1938-1968

1938-1968



1938-1968

● 汉娜·阿伦特 ● 海茵利希·布鲁希尔 ● 书信集

SERIE
PIPER

● 汉娜·阿伦特 ● 海茵利希·布鲁希尔 ● 书信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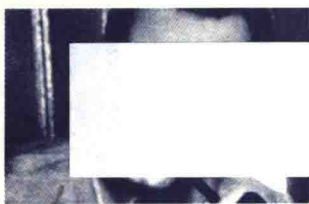
汉娜·阿伦特 / 海茵利希·布鲁希尔
书信集
Hannah Arendt
Heinrich Blücher

书

【德】罗·科勒尔 / 编

孙爱玲 / 赵薇薇 / 译

Briefe 1936-196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娜·阿伦特、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书信集/(德)
科勒尔编;孙爱玲,赵薇薇译.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5

ISBN 7-221-06563-2

I. 汉… II. ①科…②孙…③赵… III. ①阿伦
特-书信集②布鲁希尔-书信集 IV. B712.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2014 号

Hannah Arendt/Heinrich Blücher

Briefe 1936 – 1968

©1996 Piper Verlag GmbH, München, Germany

德国,慕尼黑,Piper 出版公司,1996 年版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德国 Piper 出版公司正式授予

丛书策划:徐菲·维特曼

责任编辑:黄筑荣

装帧设计:曹琼德

插图:黄 惑

**汉娜·阿伦特/海茵利希·布鲁希尔
书信集(1936—1968)**

[德]罗·科勒尔 编

孙爱玲 赵薇薇 译

徐菲·维特曼 校译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话:6828637

邮编:550001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贵阳宝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1/32 889 × 1240mm

印张:17.875

字数:417(千字)

版次: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221-06563-2/B·182

定价:37.00 元

代中译序

汉娜·阿伦特的著作以及她本人在今天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有关这位政治理论家的文章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层出不穷。在许许多多的研究会上她的名字常常不止一次被提及，她的著作也犹如一个采矿场，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发掘出一块块弥足珍贵的宝藏。

汉娜·阿伦特曾是一些男性精神大师的学生、女友，但作为一个女思想家她却让他们分享了她的荣誉。她的成就的影响动摇了男性以往在知识界自视的优越地位。人们不能再像以往一样纠缠于她与那些男性精神大师这样和那样的关系，而是不得不将整个视线投入到她的思想见解上。

1950年，汉娜·阿伦特成为了第一位有资格在法国圣母天主大学开讲座的女性。三年以后她又是第一位主持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研究讨论会的女性，此后该大学再次邀请她以首位女性教授的身份任教。阿伦特不喜欢被看作是一位特殊女性，因为这种“特殊”给她和她的犹太同胞带来过太多的不幸。一次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她在普林斯顿大学身处四周都是男性的景况：“在那次结业庆典上，我向那些体面的绅士们解释什么叫一

个特殊的犹太人,以便让他们知道我没有必要让自己感到是一个特殊的女人。”

汉娜·阿伦特对自己理解的出发点是犹太人。作为犹太人的存在对她来说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生活中所经历的迫害、流亡使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被“剥夺权利的人”。她感到自己与德国浪漫主义女犹太人范拉根、“革命的女英雄”卢森堡在思想上、精神上属于同类人物,她们都是不合群的人、爱跨越界限的人,都认识到自己是被剥夺权利的人,是世界公民,是没有家园的人。在汉娜·阿伦特身上,许多女性主义者明确找到了自我形象树立的榜样,认清了重建自身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的原则。

汉娜·阿伦特思想的出发点是理解。她曾说,男人们总是喜欢尽量去产生影响,而我只想寻求理解。然而她那些富有激情的思想却很难让人把它们归纳到某个学院派或是某种政治倾向中去。它们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不稳定性、执拗。阿伦特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您问我,我立足于何处。我没有任何立足之处。我同我的政治思想都不属于任何一个当今的或是流行的类型。这不是因为我想显得很独特,事实总让我看到我不合时宜。”

正是这种不合时宜和对独立思考的要求,使得阿伦特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典范。对那些男性规范的科学,汉娜·阿伦特采取的是保持距离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后来女性主义的批评态度是一致的。汉娜·阿伦特是一个“政治思想的流浪者”,奥地利政治学家爱娃·克莱斯基这样写道。而正是这种精神的漫游,这种不



确定性以及她在自己思想中所允许的主观性,在写作风格上所强调的讲述性,使得她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富有魅力。

我们翻译出版这部汉娜·阿伦特与其丈夫布鲁希尔的通信集,目的是为了给对汉娜·阿伦特感兴趣的人提供一个全面的她,为研究汉娜·阿伦特的学者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通信集里,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阿伦特的思想渊源,把握她的思想脉络,认识一个作为学者的她,而且我们还可以生动地认识一个作为人、特别是作为女人的她。作为人,阿伦特是一个诚实、真挚的人;作为女人,她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刻渴求着爱、理解,珍视友谊的人。她的信中没有华丽词藻的堆砌,没有情感矫揉造作的表达,没有一点装腔作势,一切都来得自然、真挚、清新。

希望这位伟大的女性以她充满激情的思索给我们带来无尽的启迪。

徐 菲

于香港阳明山庄



前言

汉娜·阿伦特与丈夫海茵利希·布鲁希尔的书信同她过去几十年中所出版的众多通信文集[与卡尔·雅斯佩尔斯、玛丽·迈卡锡、库尔德·布鲁门菲尔德、海尔曼·布鲁赫、马丁·海德格尔]相比,具有其特殊的地位。没有任何一封信能表现出该书信作者之间这种真诚的信任和理解;所涉猎的话题及人物之广泛,是以往任何书信都难以比拟的。无论是私人话题,还是说艺论道;无论是对大自然的感慨,抑或是对国际政治事件的阐述,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一种挚友般的至诚真情。

正是由于作者间的亲密关系,使得本通信集成为其他出版物的最好补充,是阿伦特遗作中惟一能表现女性的敏感、温柔、依恋的文字记载。这些书信记录了他们三十年间充实的生活经历,让我们看到,夫妇间的爱情是他们在阴霾、险恶中最安全的港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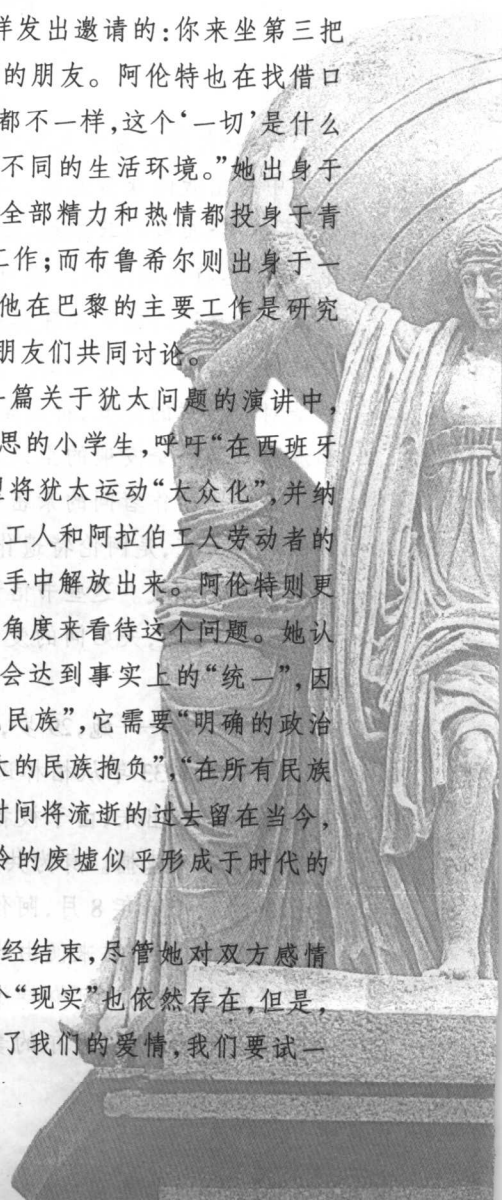
书信作者——她,29岁,他,37岁,相识于1936年春天的巴黎。他俩于1933年从柏林逃亡至此。此前,汉娜·阿伦特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由于被指控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从事非法活动而遭短暂逮捕。身为共产党员的布鲁希尔是经由布拉格到达巴黎的。1936年8月,阿伦特动身去日内瓦参加世界犹太人大会,他们的书信往来便由此开始。那时,双方与各自的配偶并未解除婚约,汉娜·阿伦特的丈夫是君特·施泰因(君特·安德森);海茵利希·布鲁希尔的妻子是娜塔丽·叶甫罗金。汉娜·阿

伦特与海茵利希·布鲁希尔分别在1937和1938年离婚,后于1940年结为伉俪。

在开始阶段的通信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他们的感情波动和对各自所从事活动的疑虑,因此怀疑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否会保持长久。布鲁希尔向阿伦特是这样发出邀请的:你来坐第三把椅子,而第二把椅子已属于我最好的朋友。阿伦特也在找借口回绝这个邀请:“你自己说过,一切都不一样,这个‘一切’是什么意思?据我的理解,其实就是我们不同的生活环境。”她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同化家庭,她把全部精力和热情都投身于青年阿丽娅和与之紧密相关的犹太工作;而布鲁希尔则出身于一个无产阶级家庭,没有犹太血统。他在巴黎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世界革命问题,与信仰共产主义的朋友们共同讨论。

他从不隐瞒自己的立场。在一篇关于犹太问题的演讲中,他称自己是“神奇大师”卡尔·马克思的小学生,呼吁“在西班牙成立犹太反法西斯战斗小组”,希望将犹太运动“大众化”,并纳入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通过犹太工人和阿拉伯工人劳动者的联合”,将巴勒斯坦从“英国强盗”的手中解放出来。阿伦特则更加理智、现实,更能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她认为,犹太人和国际工人阶级永远不会达到事实上的“统一”,因为,犹太民族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它需要“明确的政治利益”,而建立巴勒斯坦是“我们最大的民族抱负”,“在所有民族中,最疯狂的民族试图用两千年的时间将流逝的过去留在当今,他们始终乐此不疲,因为,‘耶鲁撒冷的废墟似乎形成于时代的心脏’。”(Herder)

尽管阿伦特在日内瓦的逗留已经结束,尽管她对双方感情是否牢固仍疑虑重重,尽管婚姻这个“现实”也依然存在,但是,他们决定要尝试一个新的开端,“为了我们的爱情,我们要试一



试”。在以后的几年中,对不同出身会导致不良后果的戒备在相互之间的倾慕中越发变得苍白无力,“我真真切切地感到,我属于你”。在对布鲁希尔的爱情中,阿伦特找到了归宿和防止生命基础倒塌的支点。我们在她从前撰写的自传体散文《阴影》中曾发现她的无奈和孤独。这篇附在1925年写给海德格尔信中的散文流露出她的压抑。她似乎像一个局外人游离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为了不让自己受到伤害,时时提防着“现实和存在的恐惧”。她足足用了十二年的时间,才把这种恐惧赶走。她这样给布鲁希尔写道:“我最亲爱的,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我的的确确是为爱而生,正因为如此,我着实害怕自己的迷离。就在这时,我遇到了你,这种恐惧才终于消失……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我怎么会同时得到两样东西——‘伟大的爱情’和本来的我,当我获得其中一个的时候,另一个也幸运地接踵而至。直到此时,我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幸福。”

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带给她的孤独无援常使她感到无尽的恐慌,“内心时常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人们不该分开,我快要疯了”。每每此时,她总是在丈夫的宽慰和来信中获得力量。——“你的信让我好等啊!你肯定无法想象。你就是那根带子,我因此坚信自己不会丢失。”她为自己的归宿祈祷:“感谢上帝,你就是我的家园。”

感情上的不能自信一直困扰着她。结婚九年后她写给布鲁希尔的“狂怒来信”仍然能说明这一点。那时,她不能在约定的通信时间内收到来信,因此表示无法继续在“世界上像一个失去自我、在车下空转的车轮,而没有一个家的目标,一个值得信赖的家”。她用好朋友安娜·魏尔的例子向他“抱怨”,大发雷霆:好友用了“一生的时间”养活了两个没心的家伙:丈夫和妹妹。

时下正抱病在身的布鲁希尔对阿伦特这莫名其妙的类比摸

不着头脑,对他来说,这实在“难以接受”。可他还是表现出宽容和理解:“不要那样不安、沮丧,你在这里的家无时不在等待着你的到来。不会有人在这里演奏鬼怪奏鸣曲的。”在第二封信里,他又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承认:“我是一个不懂生活的人。”他保证,她用不着考虑他们之间说话的方式,“不用考虑口语和书面语之分”。他提醒她注意,他自己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深知这其中的滋味。“我过去总是在说,‘我浪迹天涯,处处没有自己的家’,可如今,我就在这个世界的中间,通过你和朋友们建立了我永久的家园。”

当布鲁希尔不在身边时,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都会打破阿伦特感情的天平,使她一如从前的软弱,易被伤害。有一次,她读到在美国出版的关于尼采的评论,“语言的粗俗和不堪入耳,让她感到无以复加的痛苦和绝望,以致泪流满面”。

人们可以把通信集中暴露的感情脆弱归结为阿伦特敏感的天性,这和她儿时的经历密切相关。她七岁时便失去了父亲,八岁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她不得不随母亲从柯尼斯堡逃亡到柏林。尽管经历战争的时间并不长,但夫妇俩却诙谐地将之比喻为对“世界史”的亲历,使他们获得了永久的、难得的忧患意识。这种认识的源泉来自于他们生命中那些重要的经历:逃亡德国—巴黎的岁月—1939年到1940年的拘留营生活—逃出法国后在美国生活的开始—陌生的语言—陌生的国度—一个没有国籍的人(直到1951或1952年)。

尽管在美国的生活已经没有了压力,可他们并没有感到安全。1952年5月德国协定签署,布鲁希尔因此担心俄国人的影响会让阿伦特“突然掉进陷阱”,汉娜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放弃原来飞往柏林的计划。1955年马林科夫的下台,这又让布鲁希尔“吓了一跳”,他甚至想到,在紧急的情况下,将巴德学院作为

“接头地点”。当听到匈牙利政变的消息时，阿伦特也在考虑是否应该“落荒而逃”。越南战争在60年代不断升级，她估计在国内会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因此，她为自己移民瑞士或考虑重新申请德国护照做打算。对重新走上逃亡之路的潜在担心，使夫妇对是否建立婚姻中爱情和友情赖以生存的“永久家园”产生了怀疑。

汉娜·阿伦特感情脆弱，那层“忧伤的薄纱”常常挡住了她面前“美丽的阳光”。她的“过分敏感”与她在公众场合下表现出的自信和坚强形成强烈的反差，但却反映了鲜明的个性，这一点在本通信集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她怕出头露面，更愿意过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这使她更能集中精力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任何成功都无法使我摆脱‘公众人物’带给我的烦恼，我更愿意站在我的学生面前，和他们一起讨论。”她自知无法把教学工作 and 琐碎的行政工作兼顾并做，“我不能一边写书，一边教书，那是完全不同的两样工作，把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我不具备这样的天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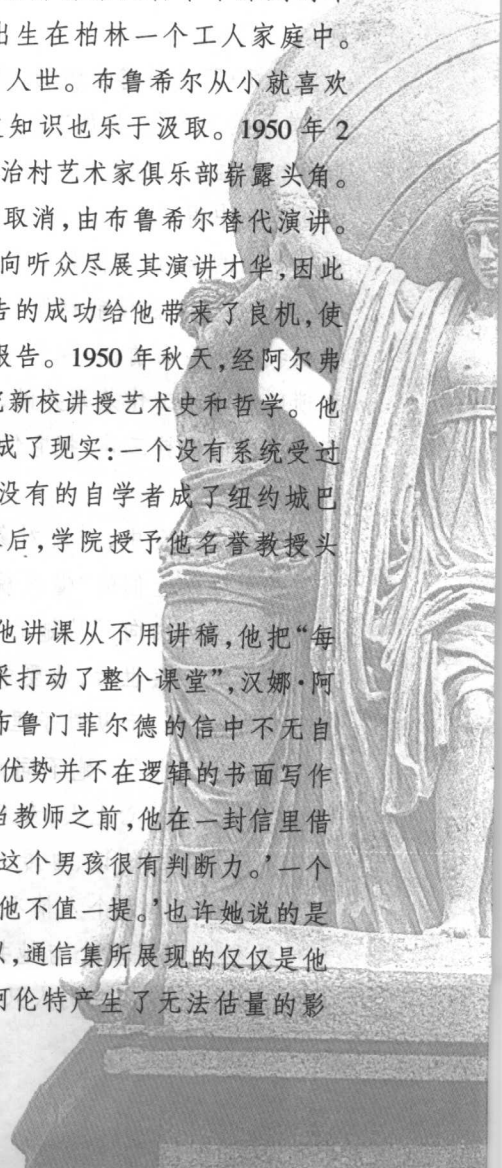
在公众场合中，交流对象的谈话风格对她显得尤为重要。加里福尼亚学生们的“懂礼貌”让她感到欣慰。“我很喜欢纽约人和犹太人的内向。”从她的习惯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她很保守的一面。母亲去世后，她要求穿黑色丧服，这样做丝毫没有“追随时髦”的意味，而从骨子里认为传统理当如此，这“似乎变成了她的第二个天性”。她不同意那些现代女性提倡独身的观点，“请相信我，我的心上人，女人只能生存在婚姻中”。

不断出版的传记、自传、通信以及采访让人们了解了汉娜·阿伦特的生活和她个人情况，她成了人们讨论的话题。人们越来越熟悉她，而对那个与她共同度过了大半个人生的人却知之甚少。对他念念不忘的人只有他的学生们，在他们的心目中，他

简直就是一个再生的苏格拉底。在他逝世二十五年后，学生们准备把他的经历介绍给后人，把他授课的内容制作成录音磁带，并保留在他工作过的巴德学院的图书馆。

这个人就是布鲁希尔。他堪称一个有政治色彩的哲学家，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出色的表达能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博览群书，自学成才。他出生在柏林一个工人家庭中。父亲在他还没有出世时，便离开了人世。布鲁希尔从小就喜欢读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书籍，对历史知识也乐于汲取。1950年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在格林威治村艺术家俱乐部崭露头角。那天，原定举行的艺术史讲座因故取消，由布鲁希尔替代演讲。他在报告中，口若悬河、手舞足蹈，向听众尽展其演讲才华，因此让听众牢牢地记住了他。此次报告的成功给他带来了良机，使他又接二连三地被邀请作了各种报告。1950年秋天，经阿尔弗雷德·卡津介绍，他在纽约社会研究新校讲授艺术史和哲学。他在欧洲无法实现的梦想，在美国变成了现实：一个没有系统受过高等教育，甚至连高中毕业文凭都没有的自学者成了纽约城巴德学院的教授（1952~1967）。退休后，学院授予他名誉教授头衔。

他用哲学的思维来讲授哲学，他讲课从不用讲稿，他把“每一句话都印在脑海中，他飞扬的神采打动了整个课堂”，汉娜·阿伦特1951年4月1日在一封写给布鲁门菲尔德的信中不无自豪地夸奖他。布鲁希尔深知自己的优势并不在逻辑的书面写作上，所以他特别懂得“扬长避短”。当教师之前，他在的一封信里借喻说明自己的不足：“一个仙女说：‘这个男孩很有判断力。’一个女妖打断了她，说：‘他只有这个，其他不值一提。’也许她说的是对的。”由于他出版的东西不多，所以，通信集所展现的仅仅是他思想的一部分；而正是他的思想对阿伦特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



响。为使读者全面了解他的思想,我们在通信集后面附加了他出版的惟一一篇哲学讲话:《一次基础课程的讲稿》。

海茵利希·布鲁希尔是从两个角度来看待哲学历史的:一方面,哲学是形成体制、创造幻想、要求有效真理、巩固统治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它又在对怀疑体制、破坏幻想、崇尚自由、积极批判进行哲学的探讨。最早的哲学阐明了传统,创造了历史,是学派间的形而上学、神学的圣女;是用于新时代的纯粹科学,是绝对的信念。而自由的哲学探讨力图通过不断地摧毁幻想,来反对强加于人的体制。虽然它的代表人物是那些最具批判性的思想家,如苏格拉底、康德、尼采,但这种哲学的探讨在历史和社会中缺乏连贯性,常常是一种机会赋予他们以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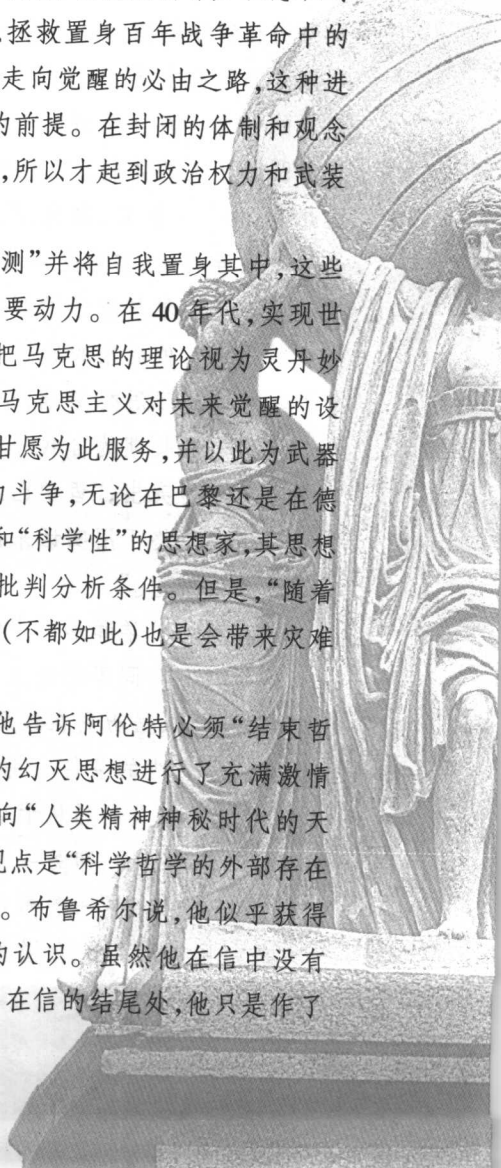
从布鲁希尔与妻子的早期通信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在40年代的思考为他后来的思想以及在社会研究新校和巴德学院任哲学教授奠定了思想基础,个人的信念也越来越清楚地得以显现。在经过了长期的自我分析后,他认为欧洲传统哲学已经结束的思想尤为突出,“哲学已经结束”。他在1948年7月9日的信中写道:“它终于用实话来讲真理,终于放弃了幻想,而不再产生进一步的梦想。”

放弃所有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幻想在当今历史进程中与虚无主义的经验具有同等的意义:“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时期。”因此,当历史在经历了灾难,并重新开始的时候,虚无主义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将自身置于空无,目的在于战胜虚无主义,这就要求人们屈从于空无的神话。然而,它却重新描绘出另一幅幻想的蓝图,即另一种形而上学的梦想:“相信了事事皆空,这真是好事啊!”布鲁希尔摒弃纯理论的思想,用一种负责的行为来克服虚无主义,他首先将其研究透彻,然后再将其彻底摆脱。

早在1946年,海茵利希·布鲁希尔在一封写给妻子的信中强调,他“所说的‘与欧洲思想决裂’是完全认真的”。这种具有挑战意味的宣言无异于一种激进的要求,即:封闭体制和绝对真理的哲学(“偶像传说”、神学、形而上学、一切现代的观念)都要被那些疑惑、幻灭的哲学研究所替代(苏格拉底的非知识意识的新批判思想)。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拯救置身百年战争革命中的人们,战争是人们渴望自由意识走向觉醒的必由之路,这种进步本身确定了在政治上获得自由的前提。在封闭的体制和观念中潜藏着暴政,由于它要求专一性,所以才起到政治权力和武装统治工具的作用。

“对所有价值观进行怀疑和揣测”并将自我置身其中,这些成了海茵利希·布鲁希尔后来的主要动力。在40年代,实现世界革命是他最大的理想,因此,他把马克思的理论视为灵丹妙药,视为一种极权的思想。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对未来觉醒的设想。身为一个积极的共产党员,他甘愿为此服务,并以此为武器与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无论在巴黎还是在德国。他坚信,马克思是最具影响力和“科学性”的思想家,其思想是进行社会、经济生活不可缺少的批判分析条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懂得了,社会主义(不都如此)也是会带来灾难的。”

在1948年7月29日的信中,他告诉阿伦特必须“结束哲学”的思想。其中,他对康德、尼采的幻灭思想进行了充满激情的批判。在他看来,是这两位巨人向“人类精神神秘时代的天堂”发起进攻并将其摧毁。康德的观点是“科学哲学的外部存在天堂”;而尼采是“道德的存在天堂”。布鲁希尔说,他似乎获得了新的灵感,对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认识。虽然他在信中没有详细说明,但我们对此却有所感悟。在信的结尾处,他只是作了



一个简短的说明：“或者，我应首先制作一张地图，远离圣人和巨人们。康德是仆人；尼采是主人；……克尔恺郭尔是一个奴隶；而我是一个‘未来的公民’。”他的目的是本着对社会和国家负责的态度要求对哲学史作全新的解读。

关于“新大陆”的讲话所涉及的内容并不仅仅限于哲学和他所熟知的政治领域，而更多的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给他带来了一个更准确的认识，即如何把空话变成行动；从纯理论的观察中走向人与人的实际关系。人在社会实践中的活动无须用自然科学理论加以指导。“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活动规律，只能在人的活动实践中形成。

和认识哲学史一样，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也从两个方面来认识政治史。一方面，政治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祸害，它把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学说作为工具，不断创造出国家统治和压迫的体系，直至发生了我们这个世纪中的极端事件：战争、革命和武力独裁。

另一种概念恰恰截然相反。此概念对政治作了全新的定义和解释，它力求建立一种没有武力的人文生活方式。在我们这个世纪中，当科学作为最大的胜利者时，已成为历史的政治却表现出它的“最大和最危险的无能”。他站在批判的立场上，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用苏格拉底的武器，坚信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最终抓住整个人类，这，就是政治的任务。

将“绝对存在”等幻灭哲学思想与政治批判性地紧密联系起来，使其在政治中发挥作用，这已成为布鲁希尔的一个不可缺少伦理假定。他对雅斯佩尔斯在1946年发表的《过失问题》的激烈抨击和愤怒的情感流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布鲁希尔思辨地看待雅斯佩尔斯的“存在观”：基督教、德意志民族，这些都

是“高尚的苏格拉底伦理,但是,这里却没有政治,也没有当今更需要的伦理观”。

海茵利希·布鲁希尔这种令人吃惊的“政治愿望”,在他《从梦境到苏醒的跳跃》一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布鲁赫曾对此文作过评论。布鲁希尔认为,讨论过失问题不能仅仅寻找基督教、德国文化、自我转变的“真实本质”,而应该认识“德国的实际冲突”所在。这种冲突表现为,许多人在“共和自由意志的问题上,不反对哥萨克的奴役倾向”。要对他们“讲明我们这个时代真实的内战前线:共和主义者反对哥萨克人,即公民与野蛮人的斗争……我们要求哥萨克人回到共和主义的道路上,为了所有倍受凌辱的人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承担起自由的责任”。布鲁希尔评价雅斯佩尔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可仅仅是个学者而已”。“我只是为了政治,为了德国人,才这样骂他的。”

从汉娜·阿伦特在同一个时期写给卡尔·雅斯佩尔的信中,也不难发现布鲁希尔的思想痕迹,但阿伦特的语气要和缓得多。1946年8月17日她这样写道:“我和先生重新对那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所以,下面所谈的内容实际上是‘我们’的讨论结果……先生始终认为,我们所承担责任的范围应该更加广泛,仅仅承认失败是远远不够的”,应该“从正面积极地表达那些牺牲者们追从政治的愿望”。汉娜·阿伦特在给丈夫的信中,也会对她所尊敬的老师进行直言不讳、甚至言辞激烈的抨击。1946年7月10日的信是这样说的:“你看看雅斯佩尔写的那些东西!这个人居然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对现实作出如此令人吃惊的评价。”布鲁希尔的措辞则更加强硬,毫不客气,如:“奉承民族主义的空话”,“毫不奇怪,他简直像一个布道的牧师。”发怒后,他总是请求阿伦特原谅自己,“最亲爱的,请别生我的气,不然,这些话我该对谁说呢?”